

等。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承担了承办西部院校大学生科创项目比赛和现场评比等活动的安排和组织。项目于2016年圆满结束。

结语

与2007年建系初期相比，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建系初期每年只招收一个班35名学生，到现在的每年招收四个班150名学生；从没有硕士点和研究生，到建立硕士点、每年招收30余名硕士；从无科研项目和零经费，到累计获批国家基金项目、青海省科技厅项目18项，每年数百万科研经费进账；从最初只有6名专业课教师，到今天44人的专业教师队伍；这些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的可喜进步。

当然，与国内其他高校的计算机系相比，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还有相当的差距，对口支援青海大学还将继续。从2007至2020年，清华已连续选派了四位教师担任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主任，包括我、黄维通、史元春、陈文光。在任期间，我参与筹划并组织实施了“清华携手Google助力西部教育”项目，2012年从青海大学卸任后，又筹划了“西部计算机教育提升计划”项目并参与实施。

从2006年接受对口支援西部教育的使命算起，到2016年“西部计算机教育提升计划”项目圆满收官，正好十年。这十年能参与支援西部教育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十分激动。

（转自《继往开来——清华园里“新工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陪同留学生的日子里

○张景玺（1966届电机）

本文中张景玺学长回忆了20世纪60年代陪同越南留学生的学习生活。近日，为把当年的情况清楚完整地还原，电机系校友和老师展开了充分沟通，补充了很多新内容和图片，钱家骊、吴维韩两位年愈九旬的老教师还亲自撰文，补充回忆了若干细节。现将三篇文章同时刊出，以完整介绍当年为培养越南留学生学校和师生所做出的努力。

1960年，我从陕西省延安中学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本应1966年夏天的毕业分配推迟至1967

年底。因此，我们这一届学生在校待了近七年半。相信每一位清华学子对于清华母校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可尊敬的师长、亲爱的同学都会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此，我对在清华陪同越南留学生的一段生活予以记述。

清华当时有来自苏联、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锡金、印尼、老挝、叙利亚、尼泊尔等国家的留学生，分属各个系级，留学生的总负责人叫陈林成。

1963年，我们三年基础课学习结束后，电机系6字班即分了专业：电机、电器、发电、高压等。我被分配到高压专

业，该专业主要由原电603班为基础，人员略有调整，全班共有32人，外加几名越南留学生：阮文海、阮红日、陈德恭、陈德河、阮高盛。此后，系里便指派我班秦财水、张景玺、房金兰、张宏池、林依基五人分别陪同上述几位越南留学生，我们这几个人就离开了原宿舍，住进了留学生宿舍——静斋。

静斋是一座不大的三层楼房，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荷花池旁，据说它和明斋、善斋、新斋、平斋等都是清华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室内设施齐全，学习、生活、休息、用餐都很方便。楼内大约居住有好几十位留学生。

我们陪同留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和他们一起上课学习，解决一些学习中的问题，帮助他们补写笔记。如果仍有问题，就联系需要补课的教师。我记得我曾为他们联系过王伯翰老师、黄炜刚老师等为他们补

课，也帮他们解决生活、社交上的一些具体问题。那时，中国和越南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积极援助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

由于友好的国家关系，我们同越南留学生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友好相处、互相帮助，植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每对室友关系更为密切。我同室友阮文海的关系，可真是“同学加兄弟”，我们住在226室，上课下课一同出入，同窗三四年，平日里可以说无话不谈。阮文海高高的个子，清秀的面庞很是精干，他爱说爱笑，活泼好动，我们志趣相投，经常一起锻炼，还一同进城逛北京的大街小巷。阮文海小提琴拉得不错，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学习小提琴，为此还购买了“定音器”（小提琴由学校提供）。阮文海指导得十分耐心，后来我也学会了拉几个简单的曲子。



1965年四五月间，电机系高压专业1966届61班中国同学和越南同学在颐和园合影，共30人。前排左起：秦财水、金建华、陈祖文、刘明生、张尚武、张炳文，中排左起：陈德河、阮友宁、周家锷、王莉英、邹积余、田桂蓉、阮高盛、阮文海、黄西林，后排左起：张秉元、鲁廉、杨洪文、房金兰、黄玉泰、陈德恭、林依基、王文龙、魏善宇、马书光、陈其昌、张宏池、樊立芬、张景玺。阮红日负责照相，未在照片中

1964年暑期，我们高压专业全班前往沈阳实习，因为沈阳的高压专业厂家种类齐全。我们一行30多人，带队的是钱家骊老师。钱老师对沈阳很熟悉，对沈阳更熟悉，一路上给我们介绍了沈阳的方方面面。中外学子的此次实习收获颇丰，在高压开关厂，领我们参观并做详细介绍的人是该厂总工，他讲得很仔细，包括产品的性能、额定电压、电流、断路容量、灭弧时间、动作原理等。此后又分到各工序实习，向具体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学习请教。之后又去了高压电缆厂、变压器厂、电瓷厂等，一个多月的紧张实习，使我们大开眼界，也增长了我们的动手能力。

我们高6班，在班文体委员的组织



陪同留学生的同学合影，已知姓名的有：1排，左1张宏池；2排，左4张锡葵、左5林依基、左9陈林成、左10吴士林（女）；3排，左4沈其中；4排，左1房金兰、左2杨海春、左7、8、9为张景玺、贾仲春、秦财水。摄于1965年秋

下，还经常和留学生们一起搞活动，曾经游览颐和园、香山公园、天安门等。1965年，我们班还组织了从北京至河内象征性的“援越抗美”长跑活动，即每个同学把自己从清华园到颐和园的长跑时间、距离纪录下来，全班汇总起来，标在从北京至河内的示意图上。此活动圆满结束后，我们同系内7名越南留学生（包括阮文海等5人，另外还有黄玉泰、阮友宁同学）一起在颐和园召开了游园庆祝会。

因为越南地处亚热带，他们的高压设备绝缘必须要考虑到高温高湿的影响。所以根据他们提出的要求，1964年9月份，学校安排他们赴广州热带电器科学研究所进行实习，带队的是吴维韩老师，陪同的学生有秦财水和我。当时，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及广州热带电器科研所，对此都非常重视，一个月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讲课、试验、测量、参观，使这批高压专业的留学生全面了解了热带气候对高压绝缘

性影响、热带电器设计标准和热带雷电的特点、测量的方法，留学生对学校的安排和照顾非常满意。除此之外，还安排我们参观了中山大学、越秀公园、五羊雕塑等景观。特别难忘的是广州外事办还宴请我们一行人吃了一顿粤式大餐。

1966年初，越南留学生就回国了。分别之际，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阮文海执意要把他的手表送给我，我实在推辞不过，接下后就上交给了负责留

学生工作的领导，之后在他临走时又还给了他。

回国后，阮文海给我来信并托我转达了对校、系及同学们的感激之情。信中，他回忆了在清华的难忘岁月，叙述了他们几位同学回国后的工作分配情况，阮文海分到了越南太原钢厂。他在信中还说：“你们送给我的‘捣毁美军战略村’模型我一直带在身边，它和我一起翻山越岭来



中越同学一起游颐和园。左起：阮文海、张景玺、陈德河、林依基

到这太原山区，每次看见它，就想起你们送别我们的情景。你们每个人的特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之间的兄弟感情、革命的战斗友谊，永远铭记在我心上。”他的字字真情让我动容。之后他又有过几次信件，后因我毕业分配至国防科委8023部队，根据保密要求，中断了和他的联系。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我见到

了返校的阮红日同学，他本人在河内大学教书，当年他是越南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回想起同学习、同生活的那些岁月，感到很亲切，他说起陈德河同学回国不久，就在美军的一次轰炸中牺牲了，令人惋惜。

岁月荏苒，一眨眼竟是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了，但却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2022年11月

我和三位越南留学生

○钱家骊（1953届电机）

1964年，有三位越南留学生编在1966届高压电器专业，因为属于我的专业管理范围，所以和他们接触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还向他们学了几句越南语。

三位越南同学是阮高盛、阮友宁和黄玉泰。阮高盛是他们三个的负责人，各种事情都是他出面。他的外貌一看就是越南人，他总是面带微笑，但微笑中总带着些严肃，我估计他将来应是个干部。阮友宁生得白白的，和一般越南人不同，他话很少，但总带着十分真诚的微笑。黄玉泰一眼看去完全像中国江南人，他很聪明，学习也最好。

当年暑假，高61班要去沈阳高压开关厂实习。厂里对此十分重视，在生活方面特别照顾，专门拨了一座二层小白楼供我们住宿。我们三位老师吉嘉琴、陈才敏和我以及几位陪留学生的同学也就同住了。这样，我们不止在学习方面，在生活上和留学生们也就更亲密了。他们要老师唱

歌，陈才敏就唱了个儿歌《两只老虎》，我和阮高盛下陆军战棋，学生秦财水做裁判，结果1比1，打了个平手。

后来，学校提出教学要“少而精”，我开的“高压电器”课就删去了几节课。这时，阮高盛找到我，说根据他们上级的意见，他们不要“少而精”而是要“多而精”。我只好把原来删去的几堂课专门给他们三个人讲了。1965年秋季开学，我报名参加“四清”运动，以后又是“文革”，他们也提前离校，我没能欢送他们，有些遗憾。

以后中越交恶，我有些担心他们是否会被当作亲中派受到不公的待遇。直到“文革”结束后几年的一天，阮高盛突然来清华访问，老师们知道后都十分高兴。我们问了他这些年的情况，知道他并非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当了干部，而是当了高压电器研究所的工程师，研究生产避雷器等产品。他送给我一本他们研究所的产品说明书，但印刷得十分粗糙。我特意问他，